

汉传密教

严耀中著



学林出版社



B946.6
Y074

本书系国家九五社科重点项目之一

汉传密教

严耀中著



学林出版社



00724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传密教/严耀中著. -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1

ISBN 7-80616-757-9

I.汉… II.严… III.密宗-发展-历史 IV.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0454 号

汉传密教



作 者	严耀中
责任编辑	乐惟清
封面设计	周剑峰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 (文庙路 120 号) 电话: 63779027 传真: 63768540
印 刷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2.4 万
版 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书 号	ISBN7-80616-757-9/K·31
定 价	16.00 元

数字图书馆
PDG

序

黄心川

密教是大乘佛教的一个派别，是相对显教而言的。密教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俗信为其主要特征，宣传口诵真言咒语（“语密”）、手结印契（“身密”，即运用手势和身体的姿态）和心作观想（“意密”），三密与诸佛之身、口、意相印，即可成佛。印度婆罗门教采用咒术密法起源很早，佛教在其诞生时释迦牟尼曾坚决反对施行密法，但在印度佛教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其最后一个阶段也采用了秘密的行事，逐渐成为有纲领、有组织的派别。密教传入我国内陆地区一般以晋僧帛尸梨密多所译《大灌顶经》为嚆矢。我国学术界一直把3世纪以前就开始传入汉地的种种经咒、仪轨等称为杂密；在8世纪印度的《大日经》和《金刚顶经》等传译后出现的体系化的密教称为纯密，其时间大概在唐玄宗“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华期间，在唐中叶以后曾一度兴隆，但在会昌法难以后就开始衰颓。北宋时，由于印度无上瑜伽部的崛起，大批僧人来华，译出了印度密教根本经典一百二十余部，因此稍有复苏。元朝时，由于蒙古统治者的偏信，在汉地推行藏密，因此“秘密之法日丽乎中天，波渐于四海”。明清以后，密教不但与佛教的显教——天台、华严、禅宗、净土结合，也与中国传统的

儒、道等相交融，在民间很流行。辛亥革命后掀起的佛教复兴运动中，也有不少人从日本携回东密、台密的经典，广为宣传，极一时之盛。可见，密教在我国唐以后的各个朝代都有传播，法脉不断，但由于密教的某些行事常常与我国汉地占统治地位的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相违，因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的制约，未能像显教宗派如禅宗、净土宗那样兴隆盛行。

密教在汉地有着如下的一些特点：首先，在汉地流传的密教，从教理、崇拜的神祇、仪轨、行事等方面看，有着种种不同的渊源和形式，其中有来自印度婆罗门教——印度教和佛教的，也有来自中亚萨满教、蒙藏密教和云南阿闍梨教等等。密教不仅与净土、华严、天台、禅宗等相结合，也与中国传统的儒道和固有的道德伦理思想乃至古代的流行方术——“六甲”和占星术等相混融。其次，由于密教的世界观并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提倡积极入世精神，重视现实的物质生活和人们的感受经验，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客观上不自觉地促进了科学，特别是医学、天文学和化学思想的发展。密教很注意如何保持和促进人们的生理和心理的健康，从而产生和发展了炼丹制药、服饵养生、吐纳调息、体育锻炼（瑜伽术）和性科学（房中术）等等。此外，根据密教的教义和实践还创造了一套独特的文学、艺术，这包括说唱文学、图象雕塑、音韵和书法艺术等等。在密教流行的地区公开或秘密的传播，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再次，汉地密教从其诞生起，就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控制和管理，很多密教僧侣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受到优渥礼待。封建帝王们为了求得王朝的永世太平、自己物质生活的骄奢淫侈和精神生活上的慰藉，不惜动用国家的财力和人力营造华丽的地宫、密坛，建立皇家道场，铸造金银神像和祭祀器皿，

定期举行大规模的舍利崇拜或种种密仪。因此，密教是统治阶级手中掌握的一种隐蔽的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当然，密教在某些时期也曾经作为组织农民起义或反叛作乱的旗帜，起过某些推进历史的作用。

本书作者严耀中同志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他长期耕耘在宗教史的研究领域中，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著作和论文，是我国佛教学术界的新秀。本书是他继研究江南佛教史后的最新的研究成果，他为了写作此书，多年来奔走各地，博采佛教藏内外有关史料、典章文物、民间传说等等，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校勘、考证和比较研究等等，给予了科学的新的说明。由于密教的活动和文字常常不向外界传授，因此收集起来倍觉困难。我国近年来虽然发表了不少有关密教的著译，但其中极大部分属于西藏密教。有不少汉地密教的撰述也都局限于对唐代密教、宋代密教经典的翻译和对元朝喇嘛教在汉地的泛滥等等的阐释，至今还没有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专门论述汉地密教发展历史的著作，严耀中同志在这个方面进行了努力，取得了成功，填补了空白。他对汉地密教的起源、历史发展过程，社会影响、重要寺院、僧人、有影响的经典、密教诸神与民间信仰的关系等等都作了详密的考证和论述，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和可靠的证据，这使我们对密教在汉地的发展有了全景式的、完整的认识；其次，作者在撰述中十分注意密教在传播中与佛教显教中各派的关系，这些关系也就是持咒、参禅与教观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正是汉地密教的核心内容和特点；关于密教与历代帝王的关系，作者除了阐述“护教”与“护国”的关系外，也提到了密教在中国农民战争和“反叛作乱”中的种种事实与表现，这种评论是比较全面和实事求是的，在同类的研究著作中还未见到过。密教传入云南后是否

存在着“滇密”的问题，在目前学术界中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作者在此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颇有见地。总之，这是一本虽然很专门，但也是解释密教不密的著作，值得向读者推荐。严耀中同志时值壮年，如能锲而不舍，当在中国宗教史研究领域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故乐为之传。

1999年5月20日于北京车公庄



目 录

序 黄心川	(1)	
一、密教和汉传密教	(1)	
二、密寺三题	(16)	
其一:《洛阳伽蓝记》“法云寺”条考释	(16)	
其二:论“大兴善寺”的地位	(24)	
其三:五代以降的密教寺院	(30)	
三、宋代的密教高潮	(37)	◇
四、明清时代的汉传密教	(52)	◇
五、试论汉传密教与天台宗的结合	(65)	
六、本体上的一致		
——华严宗与密教	(82)	
七、禅与密教	(95)	目
八、现实与彼岸佛国的统一		录
——述论密教与净土宗的关系	(116)	
九、密教与戒律	(133)	
十、自残和供养	(147)	
十一、密教与丧葬祭祀	(160)	◇
十二、《孔雀王咒经》和《大悲咒》	(182)	◇

十三、护教与护国	
——毗沙门天王崇拜述论	(196)
十四、农民战争和反叛作乱中的密教	(210)
十五、藏传密教对内地影响述论	(226)
十六、滇密源流之探索	(246)
十七、论宝志和尚的形象	(257)
十八、五通神新探	(270)
十九、《新唐书·惠庄太子传》中的“西土树神”	(288)
二十、“狮子大王”考	(303)
后 记	(317)



一、密教和汉传密教

密教 (Tantrism) 是西方学者对东方一些神秘主义教派的统称, 既包括印度教的, 也包括佛教的。印度佛教中的密教, 也称真言乘 (Shingon Buddhism)、金刚乘 (Vajrayana Buddhism) 或密乘 (Esetoric Buddhism) 等等。

一般的佛教史著作都能告诉我们, 佛教在印度的历史基本上可分三个阶段, 即自公元前 5 世纪佛陀创立该教至公元一世纪左右是为小乘佛教, 其后至 7 世纪是为大乘佛教, 再后则是密教了, 它一直到 13 世纪在伊斯兰教的冲击下衰亡, 印度佛教史画上句号。

佛教中的密教是相对显教而言的,^① 它在教义上和宗仪规上都与前者颇有相异之处。关于印度佛教中的密乘和它的历史, 中外学者多有论著, 且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密教的性质特征, 甚至定义。与佛教的其他教派或学派相比, 它大体上有五个特点。第一, 密教很好地处理了一神与多神的关系, 即以一神化身多神, 诸神则以一神为本。它拥有各式各样的佛、菩萨、天王、金刚等可作为信徒们的本尊神, 即所谓“密教特色, 在事多神”^②, 然而那些神祇统统又是法身佛大日如来 (即毗卢遮那佛^③) 的派生。大日如来是宇宙的本体, 是生死万物

及诸神佛的本源,唯此独尊,因此它又有着—神教的倾向。

第二,现象是本质的,“是实在的方便而必然的假现”。而且密教更进一步认为,每一个现象都包含着本质的基因,“个体与现象不可避免地止宿于全体和实在中,并且象征它们。”

① 故能当相即道,即事而真。而事相真性的显露除了靠自身观取“如如法性之相”外,还需大日如来的神力加持。

第三,修行者个人与大日如来直接或间接的沟通过程,就是受神力加持的过程。其成功者则由此与法身佛大日如来永恒的本质相连而能即身成佛。若此成佛不仅是如禅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般是在精神上的,而且也是在肉体上的所谓“肉身成佛”,就是“虽入无漏而不舍有为,即色以证空也”,⑤以最后达到“体如虚空(耀中案:但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真空),不始不终,不垢不净,不边不中”⑥的境界。从这点上说,它同道教修炼神仙,与道合一的途径相类似,“各自开拓致使长生不老的养生法”⑦,是以磨灭生死界限来取得现实世界和彼岸世界的统一,不同的是密教修行中包括着“借他(大日如来)力”的方面。

第四,密教即身成佛的目标是通过个体生命与宇宙不息的生机合一而实现的。这中间,曼陀罗或曼荼罗(在梵文中有两个相对词,其中 mantra 音译为曼荼罗、满荼罗、漫荼罗等,在吠陀中意译为赞歌、偈诵、诗节,在宗教中意译为神咒、真言、明咒、密咒; mandala 音译为曼陀罗或满担罗等,意译为圆台、坛场、祭坛等。前者是语言,后者是实物。⑧)作为一切生机的最根本脉动是密教修炼的关键钥匙和操持现象演变的基本法术,即由此建立身、口、意“三密”诸法。曼陀罗(或曼荼罗)是由一些语音组合和图象构成,这些符号被认定为大日如来向修行者所传递的秘密法语,或成诸陀罗尼(意译为总持、能

◇
◇
◇第一章
密教和汉传密教◇
◇
◇

持、能遮、神咒等，在佛教中用如曼荼罗），象征着其所加持的神力，密教之称亦由此而来。故所谓修密，也可说成是“乘陀罗尼加持之力，竭烦恼海生死之津”^④。此外，“由曼陀罗的考察，能知道（大日如来）佛身的相状、佛身的建立、佛身的象征等等。”^⑤密教通过曼陀罗（或曼荼罗）这样的符号来代表事物乃至宇宙的本质，与中国的象数之学颇相类似。

第五，如果说为大多数教派所共同信奉的佛教主流思想是在去除“业力”的名义下，以消解人的生存欲望及其所派生出来的种种生命力来走向涅槃的话，那么密教似乎是相反相成，即以无限弘扬生命力的方式来回归本体，从另一个角度来悟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真谛。这在实践中于是就有了“以欲制欲”的思路，如以“男女双修”为表象之一的无上瑜伽。那种瑜伽“不弃去世俗目标中之菁华，却将其扩大，发现于今从之隐障了的更真更大底意义，且生活于其中，将其从一有限底，世间底，有生死底事物，转变为亲切底，神圣底，永生诸价值之一形相。”^⑥在这点上，虽然一般都认为这和印度传统文化中的性力派影响大有关系，但本书以为它和道教的理论与实践却比较接近。

关于密教在印度佛教中的历史，其基本线条在各种佛教史论著中都得到了描述。在这中间，有两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密教虽在印度佛教发展的最后阶段凸现，但其在佛教创立伊始已有了它的萌芽。虽然佛陀是反对使用咒术的，可是在现存最早的佛经如《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等里面或载有止牙痛、防蛇咬等简单经咒；或有着佛教徒使用咒语的记载。可以说，这是曼荼罗在佛教中的最初痕迹。这一方面说明，从佛教形成的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周围文化的影响。正如大村西崖先生早就指出的那样：“诵

咒、烧火、诸祭祀法，如密教所传者，原是印度婆罗门古来之俗。而咒术吠陀者，先于释尊盛行于世。”⁴² 另一方面也说明，密教在佛教中的存在是长期的，而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渡边海旭先生形容这个过程道：“（密教）自小乘教阿含部之经典发芽，而开一种变色花，历然可观也。”⁴³ 一朵因时、因地、因人而变化不定的花，是对密教最恰当的描述。

二是在密教的咒术仪规中夹杂着一些道教等中国化的内容。“印度密教和中国道教之间有着生来俱成的、历史的联系。在这种联系的建立中，佛教显著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⁴⁴ 这个佛教其实就是密教。说得更具体一些，道教是经中国西南诸省流入印度阿萨姆等地后才（在佛教中）促成密教的。⁴⁵ 这种说法虽还未被更多的学者所认可，但无论如何，在密教的经典仪规中有着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内涵却是不争的事实。如黄心川先生注意到“印度密教经典《度母秘义经》、《摩诃支那功修法》、《风神咒坦多罗》都说密教修行方法之一的‘支那功’是向中国学习的。《度母经》等还传说印度密教著名的大师殊胜（Vasistha）曾来中国游学。又据泰米尔印度教经典记录，南印度湿婆圣典派的十八位‘成就者’中有两位是来自中国的道教徒。”⁴⁶ 还如据萧登福先生的研究统计，在现存的密经中，有一百八十二部的经中混含着道教的东西，诸如星相占术、延寿丹药、宝剑印符、五行阴阳、及“青龙、白虎、飞尸、邪忤等中土名相”，特别是“唐金刚智译《马鸣菩萨大神力无比验法念诵仪轨》、唐不空译《马鸣菩萨成就悉地念诵》；此二经以马鸣菩萨为蚕神所联想出来的。”⁴⁷ 而对蚕神的崇拜只能始自丝绸之乡的中国。而“金刚顶法始备于唐土”，以及金刚、胎藏两部密法的合流，亦由中国启其端，⁴⁸ 当亦是密教受中国文化创造力影响的结果。这不仅证明中印二国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而且

也为后来密教在中国迅速地当地的民间文化融为一体埋下了伏笔。

密教传入中国后也就有了汉传密教之说。密教进入中国有二大流，一支传向西藏，与当地原有的本教相融合，被称之为藏密，或有俗称其为喇嘛教的。由于其处于青藏高原的独特自然地理环境中，不仅使其在宗教形态上长期保持着适应当地生存条件的特殊性，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阻碍了其跟内地佛教的交流，使得这二者各成一统。主要自元代以后，由于政治等原因藏密对内地密教间有影响，时起时伏，时显时隐。但不管怎样，传入内地的藏密也被异化了，如在敦煌莫高窟第四六四号窟的壁画中“善财童子故事与六字真言同处一窟，大约可以反映最迟在元代后期新的内地因素已影响到莫高的藏传密教了。”^④ 善才童子参见五十三知识而证入法界的故事主要出自《华严经》，而《华严经》曾在密教形成“汉传”的特色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详见本书有关华严宗和密教结合的部分。当藏传密教作为新的佛教因素流入中土时，《华严经》似乎又重操旧业，将其转化为构成汉密的又一新源。

另一支更早进入中国的密教流向内地，主要在汉族居住或有汉族杂居的地域内流传，与汉文化互相交融，故称之为汉传密教。这支密教由于同汉族社会文化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在形态上别具一格，从而成为本书论述的对象。除了这二大支外还有部分受印度直接影响的少数民族地方密教，若主要在云南白族中流传的密教，一般称之为滇密，或俗称阿叱力教。由于白族有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宗教，因此密教与之结合后，也形成了比较独特的形态。虽然包括汉传密教在内的汉地佛教对它亦大有影响，^⑤ 但它对汉地的反影响却可说是微乎其微。^⑥

◇◇◇

第一章
密教和汉传密教

◇◇◇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不断地会与其所处社会中的其他因素进行交流。正如罗纳德·约翰斯通所说的那样:“不管宗教是(或者不是)其他什麼东西,它都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同其他社会现象处于不断地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关系中。”^② 职由是故,传入汉族文化圈内的密教在其流播的过程中也必然与汉族社会中的诸元素彼此渗透。也就是说,密教影响了汉民族的社会生活,而后者也影响了密教,使之汉传密教多多少少地沾染上汉族文化生活的色彩,从而在形态上有异于在其他地方流传的密教。

密教是佛教最早传进中国的成分之一。在汉末三国时来到中国的支谦,译出了《无量门微密持经》、《佛说华积陀罗尼神咒经》、《佛说持句神咒经》、《七佛神咒经》、《八吉祥神咒经》,以及与竺律炎共译的《摩登伽经》等,这些都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密经。这些密经宣称其所含神咒“其力殊胜,悉能拥护一切众生,能灭邪道,断诸灾患,”且“用自利益,亦安乐人。”^③ 它们的出现是紧接着东汉桓帝、灵帝时的最早几十部译经之后,可以说也是属于最先翻译成汉文的那批佛经之一。

密教内容能很早地进入中国,是由几方面因素决定的。从印度方面来说,自佛陀去世后,密教的成分由于社会环境的作用在佛教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大乘佛教的得势实际上也是为密教在理论上作了准备(因此它后来在中国能与大乘诸宗很好地结合,这是后话。)。一般认为,佛教是在东汉初传入中国,至三国时方开始有了较强的传播势头。至那时,密教已在印度佛教中占有相当的分量,很多当时流传的佛经中已载有陀罗尼咒语,并出现专门的密经。因此密教在那时已拥有了传入中国的充分资源。

密教成为率先传入中国的佛教内容之一，也是和当时中国的文化宗教情势有关。首先，汉末的社会政治陷入了大动乱的局面，“往者汉祚式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几于泯灭。”^④于是，中央专制集权的东汉朝廷权威丧失，行政系统瘫痪而面临崩溃。东汉政权由此失去了对社会意识的控制能力，这不仅为佛教传入、道教形成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且使得平时被斥为淫祠杂神的各种民间崇拜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出现。如汉末在南京钟山逐贼身亡的蒋子文因巫祝代其宣称“吾将大启祐孙氏”，而被东吴立庙封侯，^⑤成为江南割据政权的福佑神。由于这些“淫祠杂神”的巫术色彩特别浓厚，就为咒法密术的传入创造了良好的需求氛围，在早期传入的那批密经中有多本《咒经》，此外在其他经中也载有不少密咒，如在《摩登伽经》中就有六句神咒、婆罗门咒、释尊拥护阿难咒等八首密咒，这些都是当时的那种需求的反映。

其次，也和道教有关。在佛教传入刺激下形成的道教由于它承袭中华传统文化的诸多因素，所以一开始就发展很快，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当时道教在民间的巨大影响力。在那种形势之下，外来陌生的佛教为了能在中国民间站住脚跟，就不得不混同于道教，进入被一些学者称之为“道装佛教”的时代。^⑥其中讲究练气净神，“游心于玄冥”^⑦的《安般守意经》等小乘禅学佛经率先传入中国，正是因为那个时代背景。这同样对密教很有意义，因为一来密教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就吸收了某些道教成份，所以它对道教无疑有着一一种先天的亲和力。二来道教由于受到中国传统巫神文化的强烈影响，其宗教实践性远过于其宗教哲理，尤其是在道教早期。密教的咒言法术和道教的符咒法术之间颇有形似之处，容易混通。所以在上述条件的作用下，密教成为道装佛教中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不是偶然的了。

密教很早传入中国的结果使它在形态上产生了三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其一是,除了汉魏间那段最早的时间外,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译经事业的发达,印度产生的密经很快就有了汉译本。因此至少就密教经典而言,印中二地的密教是在几乎是同步地发展着,或如大村西崖所说:“(密经)译经年代之距作经年代,常不太远”^②。于是从汉译密经的翻译次序,就有可能寻出秘密佛教在印度发展的轨迹,如在佛前供奉香烛鲜花和颂唱陀罗尼等“趋势产生及其演变是从现存的译成中文的佛教文献里反映出来的”^③。从这点出发,我们还可以看到汉地密教的发展呈现连续不断的线状,而不是呈阶段性的跳跃,每一种仪规、一部大经的产生都有着相当明显的前因后果。如20世纪80年代末发现洛阳龙门“刘天洞的大日如来像完成于开元三大士建立密教以前,它应是依据较早的密教经典雕造的。”^④又如“在中国,金(刚)、胎(藏)两部的大法合流,而成为一个体系,这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⑤。而所谓“善无畏奉诏译”的《尊胜佛顶修瑜伽法轨仪》,“虽云翻译,实则撰述,合胎、金两部之意而作此轨”^⑥。这些事实表示汉传密教早就有着其自身发展的脉络。当然和其他中国佛教派别一样,密教的某些内涵及其社会政治影响力会因世而异,但就其本身来说,却是一条割不断分不开的流,其间无所谓有什么正、别、纯、杂之分。

其二,如果说密教在印度的发展是一个产生愈来愈多相对于显教之特点的过程的话,那么它在中国汉地则基本上进行着一个相反的历程,一个将密教与显教不断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既体现在教义、仪轨、乃至佛像寺院上,更是在于前前后后涌现了一大批“内精五教之宗,外善百家之奥”、“显密